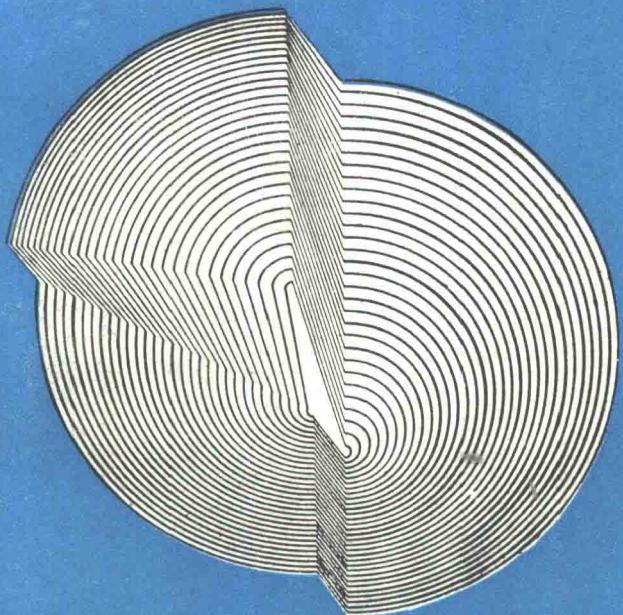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 历史与现状

王瑶 樊骏 赵园等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历史与现状

● 王瑶 樊骏 赵园等著

● 《文学评论》编辑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 王中忱
责任校对 易小放
封面设计 鹿跃世
版式设计 张汉林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

王瑶 樊骏 赵园 等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激光照排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75 印张 2 插页 417 千字

1989 年 7 月第 1 版 198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5004-0418-2 / I ·50 定价：6.90 元

编 者 前 言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述评性文字明显地增多了：不但在学术刊物上可以不断读到这类文章，还陆续出版了好几本这方面的专著。这种研究的研究，即对学科本身进行剖析评价，已经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了。

这些文章和著作，在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成就时，大多着重总结了“左”的思潮和一些政治干扰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和其中的经验教训，带有思想上“拨乱反正”和对历史进行“反思”的鲜明特点。在译述近年来的研究状况时，注意总结在研究课题和领域、研究方法、文学观念、学术观念等方面开拓和突破，同时指出由此引起的困惑和问题，显示出开创新局面的蓬勃生机。它们都是从今天的时代高度和时代要求出发，对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理性的审视和判断。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从二十年代算起，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了。在经历了曲折艰难的跋涉以后，近几年来开始进入比较稳定、健康的阶段，研究者也终于能够专注于正常的学术思考和科学探讨了。每年发表论文千余篇，出版专著几十种；若干僵化的模式打破了，一些新的探索展开了；整个学科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如果说重新鉴定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时获得学术进展的最新信息，从来都是研究者确定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必要依据；那么处于如今这样巨大的发展变化中，这种需要自然尤为迫切了。但在

另一方面，面对着如此迅速的跃动和如此众多的成果，任何个人又都难以独立地、直接地对情况及时作出完整系统的掌握，而不得不借助于分工合作、集思广益的方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提供和储存学术信息，交流和切磋历史经验的研究述评工作，不只对于有关的研究者颇有参考价值，也是学科建设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这类文章和著作，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有关研究工作的史实，理清发展脉络，勾勒基本轮廓，进而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和提出应该注意的问题；难以就专门的学术课题充分阐述自己的论点，因而一般都被视为资料性文字。其实编写起来，倒是相当费力的。对有关的研究作历史的回顾，往往需要上下求索几十年的踪迹；对有关的研究作现实的巡视，也常常要翻阅头绪纷繁的千百篇文章；不但需要通盘了解研究的成果，还得以熟悉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作为前提。所以，这又是一项应该加以提倡和受到尊敬的工作。

鉴于以上认识，这几年里《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都注意刊登研究述评的文章，如今又从这两个刊物和其他学术刊物、著作中选了二十六篇文章，编成此书。供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教学、编辑工作和一切爱好、关心这门学科的同志置于案头，便于随时查阅参考。

本书共分四辑：

第一辑三篇，是对于二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整体考察。文章重在勾画这门学科的大致眉目，和对之作出基本的估计。把它们放在前面，可以对这门学科的几十年历史进程和主要的经验教训有个总的印象，同时也为后面各辑关于具体问题研究的述评，提供一个较为宽广的、综合的学术背景：我们就是这般蹒跚地走过来的。

第二辑十三篇，都是关于作家研究的述评文章。这是研究述评中最为多见的形式，也是成就最大的部分。它们都以有关某个特定作家的研究成果作为述评的内容。但所包括的时间，有从一开始直到如今的，有选择了新中国成立前或成立后的，有截取“文化大革命”之前或之后的，也有只探讨近几年的进展的：长短各不相同。所介绍的范围，有包括作家各个方面在内的研究的，也有只就他的部分作品的研究而言的：大小宽窄不尽一致。在写法上，或重视历史事实的介绍即所谓“述”的，或喜欢陈述个人的见解即所谓“评”的：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大多能在具体的分析中闪出发人深思的历史启示，帮助我们找到发展提高的途径。

第三辑四篇，原本都属书评。但所评的著作都是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评者又力求从有关研究的前后发展中分析评价这些著作。评论的只是不多的几本书，比之其他各辑文章直接涉及的范围小得多，但评者的视野和思路却是开阔的。于是这些文章也同样起了研究述评的作用。关于台湾出版的一套现代文学研究丛书的评论，诚然只是初步的介绍，但作为大陆作者对台湾同行的研究成果的述评，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学术交流，当为海峡两岸读者所共同欢迎的吧！

第四辑六篇，都是按年编写的。与前面作纵向考察的诸篇不同，这几篇取的是横向的鸟瞰，留下了近几年来研究工作探索前进的足迹；将这样的述评编排起来，当是一部现代文学研究的编年史。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这六篇文章都没有将鲁迅研究包括在内，我们请人撰写了《1980—1985年鲁迅研究述评》（收在第二辑内），这是本书唯一的一篇没有发表过的文章。

这些文章述评的复盖面，有时不免出现重叠；但各自扫描的角度、叙述的方式、论证的思路，却是纵横交错着的，

由此得出的看法和结论，也多有差异以至于抵牾的。无论是同还是异，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门学科的历史和现状，从而更坚定地迈步前进。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感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述评工作，尚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述评的选题不够丰富多样，还有许多方面和问题有待分析和评价；述评的模式显得单调呆板了些，需要摸索出更多的角度和方式；如何融“述”和“评”为有机的整体、如何处理好历史感和时代性的辩证关系，更是提高研究述评学术水平的关键所在。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准备每隔三、五年选编这样一本书。为此，热切地盼望能不断有更多更好的研究述评文章和著作问世，也诚恳地期待读者对本书的编辑作例、选择标准和内容等提出批评和建议。

编 者

1987.10

目 录

| | |
|-----------------------------|-----------|
| 编者前言 | (1) |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王 瑶 (1) |
|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 | 樊 骏 (14) |
|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 | 邢铁华 (39) |
| 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五年鲁迅研究述评 赵存茂 (62) | |
| 茅盾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叶子铭 (87) |
| 郭沫若史剧研究：挣脱狭隘功利 | |
| 羁绊的曲折历程 | 魏 建 (116) |
| 进入多维视野的老舍 | 宋永毅 (143) |
| ——近年来老舍研究述评 | |
| 巴金研究的回顾 | 李存光 (164) |
| 一九三四年——一九八五年曹禺前期剧作 | |
| 研究述评 | 马俊山 (181) |
| 郁达夫研究述评 | 邢少涛 (202) |
| 建国前闻一多研究述评 | 江锡铨 (224) |
| 在历史的反思中探索 | 赵学勇 (241) |
| ——近年来沈从文研究述评 | |
| 近年丁玲研究述评 | 陈惠芬 (265) |
| 近年来冯雪峰研究概述 | 萧 思 (288) |

- 近年来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综述 侯 敏(298)
- 赵树理创作研究：历史沉浮中一个
 复杂的文学选择 刘新华(313)
- 鲁迅研究与鲁迅传记的写作 徐光明(337)
 ——兼谈新出的七种鲁迅传
- 茅盾研究新起点的标识 吴福辉(358)
 ——评四本论述茅盾文学历程的专著
- “对话”，在契合与超越中完成 曹惠民 朱栋霖(370)
 ——兼评《巴金论》、《巴金论稿》等
- 评台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三十本） 张建勇(384)
- 一九八〇年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张建勇 辛宇(394)
- 一九八一年现代文学
 研究述评 张建勇 刘福春 辛宇(416)
- 一九八二年现代文学
 研究述评 张建勇 刘福春 辛宇(434)
- 一九八三年现代文学
 研究述评 孟繁林 王保生 辛宇(459)
- 一九八四年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王保生 孟繁林(479)
- 一九八五：徘徊、开拓、突进 赵 园(50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王 瑶

一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解放前，有关现代文学的论著大多是从当代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的作家作品评论，或者是作为中国文学史附庸的最后概述章节，这说明现代文学研究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如此，解放前的有关论著仍然是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的。

一九二二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最末一节，曾经“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这可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形成进行历史考察的最初尝试。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少数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或讲座。陈子展、朱自清、周作人、王哲甫、李何林等都讲过这样的内容，他们的讲义大多作为文学史著作出版，即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一九二八年出版，有关现代文学的“十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仅为其中一节；后又修订更名为《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由太平洋书店一九二九年出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一九三二年作，同年北京人文书局出版），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九三三年作，同年北京杰成印书局出版），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一九四〇年出版）。其中朱自清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在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当时并未正式

出版，遗稿后来发表在一九八一年的上海《文艺论丛》第十四期；它是首先以作家成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着眼在从丰富的文学现象来探讨各类作品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经验，重视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并采用了先有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评述的文学史体例，这对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是有启示意义的。

一九三五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蔡元培、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等，分别为全书和各卷写了长篇导言，对“五四”和第一个十年间的新文学分门别类地作了系统分析和历史评价。“导言”的执笔者不仅亲自参加了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而且代表了不同的倾向与流派，在导言中显示出了他们不同的文学史观，如胡适用文学进化观解释新文学的诞生，周作人以为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而鲁迅、茅盾的导言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辩证地评价现代作家、作品和流派，在方法上对以后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从二十年代末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广泛地同我国社会科学实践开始结合起来，在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派；萌发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茅盾的作家论、序跋，即是这方面的尝试。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文学的一系列论述，更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的转折，而且标志着文学的转折；从五四开端的新文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构成了完整的历史阶段，对其作历史的研究与总结，不仅有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在五十年代初，出现了一批

以高等院校教材形式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其中有：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出版、下册一九五三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写于五十年代初，一九五七年由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一九五六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蔡仪《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出版）、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出版）等，同时随着高校现代文学课程的开设，逐步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专业队伍，这些都标志着现代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本身与现实政治及当代文学的关系都十分密切；现实政治斗争及对现实文学工作的要求，都会影响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 一九五三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年召开的第二次文代大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同时，强调“‘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过来的”（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这里所提出的论点实质上是关于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重大问题；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一些研究工作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的萌芽、成长和发展”作为现代文学的基本发展线索，并以此作为划分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和评论现代作家作品的基本尺度。这意味着是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它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中“左”的倾向即由此发端。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再批判”，又把上述关于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理论错误推向新的极端；以所谓“文艺上的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斗争”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参见邵荃麟：《扫清道路，奋勇前进——〈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读后》）。继之而来的一次又一次的

政治运动，批判掉了一批又一批的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影响下，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史只能研究鲁迅一人。政治斗争的需要代替了科学的研究，滋长了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用主义学风，讲假话、隐瞒历史真相，以致造成了现代文学史这门历史学科的极大危机。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开始全面复苏。最初几年，主要是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在理论上澄清了现代文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同时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对一大批作家作品进行了“再评价”。这些工作实际上具有某种“平反”性质，因此，其中掺杂着某些强烈的感情因素是可以理解的。直到近年，才开始转入日常的学术建设，对现代文学进行冷静客观、具体细致、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考察，显示了扎实深入、稳步前进的趋势。

二

回顾近几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变化和发展，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可以说有两个方面：第一，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的逐渐深化，并由此带来研究格局的突破与研究方法的变革；第二，对“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性质的认识和变化，并由此带来研究视野与方法的变革。

近年来，对“现代文学”的性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最初的“拨乱反正”阶段，针对着长期以来存在的“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衡量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强调了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提出要以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表现得是否深刻、鲜明，作为衡量和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应该说，这是现代文学研究在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要

上
卷
C5
C5
C5
C5

突破，它带来了研究格局的变革。长期以来得不到正确评价的一些具有反帝反封建倾向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作家作品，如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作品恢复了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主流地位；另一些人则一方面与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矛盾，一方面仍然具有或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建倾向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如前期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兴趣，进入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而过去一些被肯定的左翼作家，由于有了“反帝反封建”这一更切合实际的评价标准，去掉了一些被任意拔高的虚词浮语，他们在思想、艺术上的实际成就，就得到了更为科学的说明，重新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设置的“禁区”终于打破，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研究工作的实际内容与“现代文学”学科名称之间“名不副实”的状况开始改变。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反帝反封建”的标准本身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不仅只是一个思想标准，而且在对作家作品进行思想评价时，也只是强调了政治思想的一个侧面。这就是说，“反帝反封建”是从现代文学的政治思想倾向这一方面去说明现代文学的性质的，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方面，但如果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和评价仅仅局限在这么一个方面，我们的研究视野就仍然不免是狭窄的，而且会出现一些新的偏颇。例如在一段时间曾出现过一些研究工作者在评价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并不鲜明，但在其他方面颇具特色的作家作品时，由于囿于“反帝反封建”这一批评标准，就对这些作家作品中的反帝反封建的微弱因素加以夸大，以此来肯定其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这种“肯定”评价与过去的“否定”仅仅是结论的不同；基本的评价与思维方式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因而不可能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这样，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就要求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观念要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

人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它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并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倾向与艺术表现、形式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说，它是把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质包括在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揭示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的一个概念。当然，由于它的含义广泛、包容性大，就字面意义看，也有一定的不够鲜明和确定的缺点；但“现代”既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时代概念，它最主要的内涵就是时代精神，这就是自然包孕了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观察角度，也不致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生混淆。这个概念的提出，是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它使我们研究工作的着重点由注重现代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他意识形态的共性转向了现代文学自身的个性。研究工作者不仅从政治思想的层次，而且从更为广泛的层次去揭示现代文学作品的丰富的思想内容，促使研究者更注意于文学特征的探索，例如艺术表现的现代化，文学体裁的革新，作品的叙述方式、结构方式和文学语言的变革，以及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艺术流派和风格的不同成就。这样，就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开拓，它不仅只表现在研究面的扩张，而且也是研究视角的多样化。

随着对“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必然要提出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以及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问题。本来，“文学的现代化”本身就如鲁迅所说，包含着“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①这样的内容，离开了对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联系的考察，就不可能弄清现代文学的“现代化”特点。当然，促成近年来对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

① 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的研究的重视，还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结束了在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上的长期封闭状态，国际间的文化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因而我们了解到一些国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情况；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现代文学以及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外国学者的注意。这样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气氛，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自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与此同时，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流日益密切，随之而来便提出了许多现实问题；诸如如何正确吸收外来文化并与本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如何把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有机地统一起来，等等。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密切联系，决定了这些从现实中提出来的问题的解答必须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即认真总结“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历史经验。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一是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在处理吸收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的关系、解决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关系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目前上述研究主要还是一种面上的扩展，带有“开拓新领域”的性质；如研究某一作家与外国某作家的关系（鲁迅与安特莱夫、曹禺与契可夫等等）；某一社团、流派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如前期创造社、新月派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现代派诗歌与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关系）；某种文体与外国文学的渊源关系（如中国现代散文与屠格涅夫、波特莱尔散文诗的关系，中国现代话剧与易卜生、奥尼尔剧作的关系）；某种外国哲学思潮、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如尼采哲学、厨川白村文艺思想、弗洛伊德学说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以及某一作家（如鲁迅、茅盾、曹禺）或某一文体（如现代话剧）某一流派（如现代派诗歌）在处理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关系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或教训等等。大体

上说，目前这类研究尚处于分体解剖的阶段，可以想见，今后将向综合分析的方面发展，以便从总体上把握现代文学交汇的历史特点，从文学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来研究现代文学发展的规律。

另一方面，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除了由于对“现代文学”性质的认识深化而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之外，还有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突破，就是对“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性质的重新确认，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始终停留在作家作品论的汇编的水平上，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对于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性质缺乏明确的认识。近年来，经过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明确了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的性质和特征。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它要求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历史联系。确认文学史具有“文艺学”的性质，首先是对长期存在的“以政治鉴定代替文学评价”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的一个否定；并由此明确了文学史应该以创作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衡量一个作家对文学史的贡献，确定其历史地位，主要看他的作品的质量和数量；而对作品质量的评价则应该坚持思想与艺术的统一，注意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近年来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出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过去分析作家一般偏重其政治倾向和社会思想的话，那么今天还同时重视作家的美学观点和艺术特色；以前着眼于作品的主题、题材，主要在说明作品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现在则除此之外还要探讨它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成就，现在作家的艺术个性受到了普遍的重视，研究工作者在分析作家作品时都努力把握作家的“这一个”的特点：即为作家独特的生活经验所决定的表现对象和读者对象，作家评价生活的独特角